

第二章 印尼與中共關係之回顧

自 1990 年中共與印尼再次建交之後，迄今中共與印尼關係已逐漸開始緊密發展，尤其中共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經貿快速發展，且與世界各國關係日益改善，其國力有急起直追之勢。對印尼而言，則自 1998 年前總統蘇哈托威權體制瓦解後，揭開政治改革序幕，特別是 1999 年大選結果，瓦希德與梅嘉娃蒂擔任民主改革後之首任正、副總統，在對外政策中，大幅改善與中共關係。雖然表面看來，印尼與中共加強關係有因全球化趨勢，以及區域主義等國際因素之外在環境的激勵與影響；但若進一步探討，印尼與中共關係之發展，其實仍參雜諸多兩國交往歷史與印尼國內因素，而且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隨著時代變遷，繼續在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上產生作用。

第一節 早期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1945~1950）

在印尼獨立後的數年之間（1945~1950），由於希望很快能得到國際上的承認，故積極展開外交活動，並自認係東南亞大國，曾受到過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因此，主張採取獨力自主的外交立場，且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冷戰即將開始，印尼不信任由前蘇聯或是美國所領導的東西方兩大國家集團之牽制，故積極與亞非地區出現之眾多新興獨立國家交往，其中在亞洲即與中共增進往來開拓外交關係。

一、新興獨立建國的印尼與中共相互支持與承認

印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於 1945 年至 1948 年期間與原來的殖民國家荷蘭進行了 3 年的獨立戰爭，其中帶領印尼建國之領袖蘇卡諾（Sukarno 係印尼第一任總統）甚至曾在雙方的打打談談期間，遭荷蘭殖民政府監禁。¹印尼在 1948 年因堅持抵抗荷蘭，以及獲得國際同情與聯合國的介入，得以脫離殖民地之命運獨立建國；因急於爭取他國的外交承認，使得當時也與印尼有著類似反西方帝國主義之建國背

¹ 李美賢，《印尼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年），頁 134~135。

景的中共，很快地就在 1950 年 6 月與印尼建交；²中共並藉著與印尼往來逐漸增多之機會，開始在印尼擴展共產黨的影響力。

另因蘇卡諾認為當時中共政權能成功地於短時間內控制大陸，主要原因在於擁有一個紀律嚴明的共產黨，故暗中師法中共，蘇卡諾開始培植在 1924 年即已成立的「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希望以此進行社會控制；當然印尼政府在此時期與中共關係自然地能夠密切發展。³兩國目前能夠繼續發展密切的合作關係，實源自於此一時期雙方外交發展之基礎，尤其是蘇卡諾的女兒梅嘉娃蒂後來亦成為印尼總統，其在繼承父志與中共崛起及國際環境改變等因素下，才能更順利地使印尼與中共關係向前邁進。

印尼在建國初期能與中共很快地相互給予外交承認，除了兩國為了儘快爭取國際承認之外，當然也由於早期中共聯合窮國弱國改造世界的外交政策取向所致；⁴故印尼能在中共基於其內在與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下順利發展外交關係。因此，早期的印尼與中共關係，亦可謂是植基於該兩國各自的外交利益，故在嗣後印尼因內部不同政治派系相互競爭時，為爭取政治主導權，當然也就不會將兩國外交關係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印尼政府自然有可能走向反共的立場。

二、印尼內部潛存立場反共之右派人士

雖然印尼早在 1948 年即已獨立，但其中央政府之運作則要到 1950 年，印尼各地區的自治邦完全加入統一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後，才順利頒布臨時憲法，選舉第一屆國會。當時的印尼共產黨即在全國 232 席的國會議員中，搶佔 13 席(5.6%)，故顯示共產黨在印尼仍具有一定之群眾支持基礎；但因印尼於 1950 年 9 月加入聯合國，使其內閣開始採取稍微親向西方的外交路線。⁵因此，雖然印尼與中共在 1950 年 6 月即已正式建交，且對於發展兩國間的良好關係具有期待，但卻因印

²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民國 88 年)頁 388。

³ 顧長永，《印尼：政治經濟與社會》(高雄：復文出版社，民國 91 年)，頁 38~39。

⁴ 李寶俊，〈戰略夥伴關係與中國外交的歷史抉擇〉，《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頁 76。

⁵ 李美賢，《印尼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年)，頁 158~。

尼內閣的右派傾向，使得雙方關係未能有快速的發展。⁶自此印尼政府中的反共勢力，在國內外的環境轉變中，日益提升影響力，且開始注意到共產黨在印尼國內的活動情形。

印尼與中共關係早期受到美國領導民主國家的反共立場，以及 1949 年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同時有部分支持國民黨人士轉往印尼等東南亞地區，也使得台灣國民黨透過當地華人的活動，對印尼的反共態度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迄今印尼對中共領導的政權仍有些許恐懼和疑慮。由於上述的潛在不信任，使得印尼一直到 1956 年 9 月前總統蘇卡諾首次訪問北京後，雙方的關係才得以稍微拉近。

此外，印尼軍隊力量早在抵抗荷蘭之獨立戰爭中即已建立，由於印尼第一任總統蘇卡諾並非軍人出身，故將印尼軍方力量視為支持其政權的重要勢力之一。⁷因此，印尼軍方對政局已具有一定之影響力，由於在政壇上擁有地位的將領們不願見到共黨組織在印尼快速發展，此股勢力亦成為後來在印尼國內最主要的反共力量；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也多半利用印尼軍方的反共立場，拉攏印尼成為全球反共聯盟之一環。

第二節 聯合亞非外交獨立自主之國家（1951~1965）

1950 年代的印尼仍屬於獨立建國初期，在外交活動與國際事務上，印尼還算是一個新興獨立的小國，而且在區域國家之間影響力亦是有限；因此，為掙脫原西方殖民國家的束縛，故積極聯合在亞非地區同是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於 1955 年在印尼萬隆（Bandung）召開著名的「萬隆會議」。該次會議有 29 個亞非國家領袖參加，尤其是包括了當時的中共前總理周恩來，此亦標誌著中共和印尼雙方關係開始邁向友好方向發展。⁸印尼也自此展開活絡的外交活動，其中較重要的也包括參與籌組東南亞國協組織（ASEAN）。

⁶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民國 88 年）頁 388。

⁷ 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4 年 9 月），頁 27。

⁸ 李美賢，《印尼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年），頁 167。

一、「萬隆會議」對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深具意義

印尼因為地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扼守東亞通往歐、非大陸的海上通道，加上蘊藏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向來即為列強所必爭；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印尼脫離被荷蘭殖民三百年之歷史，為保有國家的獨立自由與外交自主，自然地就採取了中立的對外政策，避免與當時的美、蘇等強國結盟。⁹在同一時期的亞洲和非洲也大量出現了數十個獨立國家，這些共同屬於反抗帝國主義的新興國家，藉由保障民族獨立、反對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等口號，共同參加印尼召開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¹⁰

萬隆會議在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上，對兩國來說均佔有重要地位以及深具意義。首先對於印尼而言：當時能夠在獨立建國不久之印尼成功地舉辦「萬隆會議」，顯示印尼已經在亞非國家之間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當時第三世界的中共、印度，以及埃及等國的領袖均出席會議，更凸顯了亞非區域國家的團結力量。萬隆會議也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其中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十項原則」，主要內容包括：（1）尊重基本人權；（2）承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3）承認一切民族與大小國家平等；（4）不干涉他國內政；（5）尊重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單獨或集體採取自衛之權力；（6）不採集體防禦為任何大國服務；（7）不以武力侵犯他國；（8）按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紛爭；（9）促進相互利益與合作；（10）尊重正義與國際義務。¹¹

就中共立場觀之，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係中共前總理周恩來在該次會議中所提出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具體化；其內涵反映了亞非國家反對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共同維護世界和平之願望。早在萬隆會議之前，1953年3月，中共與印尼兩國政府即曾在北京確

⁹ 羅石圃，〈印尼對華外交政策的剖析〉，《東南亞國家國際關係論叢》（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民國72年），頁290。

¹⁰ 梁志明，〈亞非人民的國際盛會：背景與成就〉，《當代亞太》2005年第5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頁23。

¹¹ 劉宏炬，《中國睦鄰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4月），頁404。

立以上述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¹²，作為處理兩國關係之準則。¹³印尼與中共於 1990 年復交時，在其復交簽署文件上，亦載明兩國係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和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之基礎，實現關係正常化。¹⁴顯見萬隆會議之精神，至今仍是印尼與中共發展關係的基調，以及進行各項合作所遵循之依據。

二、中共透過東協組織增進與印尼關係

東協的成立緣起與印尼萬隆會議關係密切，開啓了亞非地區主義的發展，1961 年 7 月由菲、馬、泰三國組成經濟合作組織「東南亞聯盟」，1967 年 8 月再加上印尼與新加坡共五國外長在曼谷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東南亞國家聯盟宣言)，成立「東協組織」。東協國家為表現中立化而與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關係，首先積極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從 1970 年代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先後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自此，中共與東協國家的貿易和友好合作關係逐步發展。¹⁵不過中共和東協國家的關係發展，由於雙方在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上之差異，故進行並不順利。

由於東南亞國家對前蘇聯與中共的共產主義擴張印象，使得對中共政權感到恐懼與不信任，東南亞國家與中共彼此間相互疏遠和隔絕，中共則對東南亞國家強調和平共處，建立友好關係立場（尤其是萬隆會議中，周恩來發表和平共處五原則）；再加上美國對東南亞的援助與拉攏，造成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多半持相互敵視和對抗的態度。直到 1970 年代初期，因為中蘇矛盾進一步激化後，中共為反制前蘇聯在亞洲的影響力，才轉向改善與包括印尼在內的東協國家之關係。嗣後到 1991 年中共才與東協國家全面建交（請參閱表 2-1）

¹² 1954 年中共總理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亦曾在新德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反對外來干涉是新獨立國家的主要任務，主張以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關係的準則。參閱楊福昌主編，《跨世紀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 3 月版），頁 21。

¹³ 梁志明，〈亞非人民的國際盛會：背景與成就〉，《當代亞太》2005 年第 5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頁 24。

¹⁴ 〈中國政府和印尼政府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諒解備忘錄〉，中共新華網新聞專題；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newscenter/ztlpcfytsq.htm>

¹⁵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民國 88 年）頁 356~P.364。

表 2-1：中共與東協國家建交時間表

國家名稱	建交時間
印尼	1950.04.13. (1990.08.復交)
越南	1950.01.18.
緬甸	1950.06.08.
柬埔寨	1958.07.19.
寮國	1961.04.25.
馬來西亞	1974.05.31.
菲律賓	1975.06.09.
泰國	1975.07.01.
新加坡	1990.10.03.
汶萊	1991.09.30.

資料來源：中共外交部 2004 年出版之《中國外交》

中共對東南亞的「睦鄰外交」，亦即加強與東協國家關係，中共對於東協的支持，主要是起源於對東協 1971 年的「東南亞中立化宣言」，即支持東南亞成爲一個和平、自由、中立的地區；而相對地，東協國家雖然基本上是採取反共的立場，但在外交作爲上則是以現實主義爲出發點，將戰略利益及經濟利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故願意與中共進行交往。¹⁶尤其中共自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需要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以利中共的國家發展與經濟建設，因此，需要改善和東協國家的關係。由於東協成立之宗旨在於加速結盟國家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文化發展，以及區域和平與穩定；¹⁷且該組織希望朝向一體化發展¹⁸，因此，中共在加強與東協國家發展之同時，勢將會一起提升與印尼的外交關係。

第三節 印尼與中共關係的變動與猜忌（1966~1989）

1950 年以後，印尼與中共兩國之關係發展大致穩定，但因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地區進行反共宣傳，並加上印尼的內閣成員大多爲右派人士，對中共政權仍抱持疑

¹⁶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台北：唐山出版社，民國 89 年），頁 298~303。

¹⁷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台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民國 86 年），頁 4。

¹⁸ 東協組織於 2003 年在峇里島舉行的第 9 次首腦會議中，確立要在 2020 年成立「東協共同體」（包括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參閱韋紅，〈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建設及其對中國的意義〉，《當代亞太》2006 年第 5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頁 52。

懼態度。¹⁹直到 1965 年終於爆發兩派鬥爭的「930 事件」，由於印尼對中共的不信任升高，兩國關係才進入長期凍結時期。

一、印尼疑懼中共透過華人在國內進行顛覆活動

美國學者認為，印尼高層與軍方對中共的深刻猜忌，導因於北京曾參與 1965 年印尼國內由共黨所發動的流產政變；以及印尼人向來擔心北京可能會伺機操縱印尼的國內政治運作。²⁰上述也說明「930 事件」對印尼的影響，以及 1965 年以後發生幾次排華運動之理由；在這個時期印尼政府禁止所有華人在公開場合進行有關華人民俗文化之活動，同時也禁止使用中文；這個禁令一直持續到蘇哈托下台之後，才逐漸放寬，不過已經對印尼華人內心形成無形的生活壓力，認為印尼政府始終對華人存有懷疑，使當地華人很難融入印尼社會。

在印尼與中共關係凍結（斷交）的期間，兩國的少量貿易多是透過香港採取轉口貿易方式；²¹嗣後於 1978 年中共採行改革開放政策，1985 年印尼商會主席蘇加達尼（Sukamdani S. Gitosardjono Ketua Umum Kadin Indonesia）組團訪問中共，才重新開啓了印尼與中共的新貿易關係。雖然如此，印尼與中共雙方尚未具有官方關係；直至中共總理李鵬在 1990 年 8 月訪問印尼，才開始改變自 1967 年以來，印尼政府對中共的不信任、懷疑，以及恐懼之態度。²²雖然印尼華人基於需要母國的保護心理，樂於見到印尼與中共關係改善；但也由於印尼華人在當地係屬於少數族群，卻掌握大部分經濟資源，此對僑居地國家（印尼政府）處理「中國問題」之立場，無形中會產生一定的影響。²³因此，印尼政府仍擔憂中共會透過華人組織，對印尼政局或社會、經濟等層面產生影響，破壞印尼政府對國家的主權行使。

¹⁹ 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民國 88 年）頁 389。

²⁰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R. Neu 合著，《東南亞在美國對中共策略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0 年 6 月），頁 54~55。

²¹ Hadi Soesastro, “Hubungan Indonesia-Cina Mana Dagingnya?” *KOMPAS*, Jakarta: 1 April 2002.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204/01/UTAMA/huba01.htm>

²² Bob Widayartono, “Perkembangan Hubungan Ekonomi Antara China dan Indonesia,” *KOMPAS*, Jakarta: 26 Maret 2007.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703/26/teropong/3410132.htm>

²³ 高崇雲，《中共與東南亞》（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0 年），頁 123。

從冷戰時代以來，由於印尼對中共抱持著疑懼的態度，因此印尼基於拓展國際關係，以及爭取友國提供經濟支援，協助印尼發展國家建設等主要因素考量；便開始與當時農、經發展狀況不錯的台灣進行交往，期能借鏡台灣的發展經驗，並獲得來自台灣的協助與支援。²⁴但若從當時台海兩岸的對峙狀態觀之，印尼與台灣發展較密切的關係，將能夠得到台灣大力的支援，除有利於達成印尼所需的國家建設之目標，並能藉由台灣之管道掌握中共的發展現況，以及台灣與華僑社團的交往，降低中共透過華人對印尼局勢產生影響之可能。

二、印尼在中共對外開放後基於國家利益改善雙方關係

中共自 1978 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雖受到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及當時經濟緊縮政策之影響，經濟發展曾出現衰退，1990 年 12 月李鵬在「全國計畫會議」上報告，承認中共經濟面臨嚴重困難，當年 GNP 增長僅達 4%，為其之前 10 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從整體觀察，大陸當時確實面臨經濟問題，其中包括經濟成長率激烈波動、投資規模大起大落、物價與就業率突升驟降、產業結構嚴重失衡，以及資源、人口與環保等問題。²⁵但之後中共仍能繼續經改路線，並持續發展迄今；尤其中共在 2005 年 11 月 11 日發表的「十一五規劃」，更明確描繪出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其中主要的內容重點歸納有：建設和諧社會、以環保與提升科技發展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另亦注重改革效率，期以最適當的時間做最適當的事。²⁶上述可以看出中共整體經濟實力還會繼續發展，並能兼顧其國家安全等各項利益因素，以面對未來國際環境的變化。

中共的改革與經濟發展，當然需要外交政策的配合，才容易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在 1980 年代國際局勢已顯著改變，冷戰已經接近尾聲，中共認知到當時已不同於過去中共將世界分成帝國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再加上第三世界民族國家之國際格局；1990 年鄧小平即指出，世界格局在改變，新的格局還未形成，

²⁴ 羅時圃，〈印尼對華外交政策的剖析〉，《東南亞國家關係論叢》（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民國 72 年），頁 299~300。

²⁵ 鄭竹園，《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互動》（台北：聯經，民國 83 年），頁 10。

²⁶ 〈中共第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香港文匯報》A29 版（香港：2005 年 10 月 12 日）。

國際間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與組合。²⁷因此，中共爲了能夠營造一個和平並利於發展的周邊環境，加強了中共的睦鄰外交政策，尤其是對於包括印尼在內的東南亞國家；中共即在 1991 年向東協國家表達有意成爲東協對話夥伴國，開始積極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關係。²⁸

印尼基於國家利益考慮改變與中共關係之理由，可從印尼智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donesia, CSIS Indonesia) 之學者哈迪 (Hadi Soesastro) 對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之歷史過程所提出的分析內容得知，因爲印尼與中共於 1990 年恢復外交關係實基於以下三項因素考量：首先是，中共在持續發展與崛起，印尼與中共這樣的大國建立外交關係是一個理性的決策；其次，印尼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將可能有助於印尼在區域內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第三、印尼與中共關係的改善，最重要在於提升兩國的直接貿易關係。²⁹根據上述理由，印尼與中共改善關係，對印尼而言，不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領域，均將有可能獲致諸多利益。

第四節 印尼在新外交時期與中共關係 (1990~1999)

從過去的歷史觀之，印尼與中共兩國關係最和諧的時代即是印尼前總統蘇卡諾執政時期；在 1967 年後接下來的蘇哈托總統時代，兩國關係中斷。³⁰惟嗣後在 1985 年至 1990 年雙方關係開始逐步解凍，尤其是中共爲發展國內經濟，在這一時期大量進口印尼木材以及工業原料等，使得雙方的經貿合作，成爲兩國恢復外交關係之重要基礎。³¹因此，兩國也順利的在 1990 年 8 月重新建交，從此進入了新外交時期的印尼與中共關係。

²⁷ 余正梁、陳玉剛合撰，〈中國國際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20 年〉，《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2。

²⁸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台北：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頁 207。

²⁹ Hadi Soesastro, "Aspect of Sino-Indonesia Economic Relations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CSIC, 1992). 參閱 Bob Widyanarto, "Perkembangan Hubungan Ekonomi Antara China dan Indonesia," *KOMPAS*, Jakarta: 26 Maret 2007.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703/26/teropong/3410132.htm>

³⁰ Shafiah Fifi Muhibat, "Hubungan Indonesia-RRC," *Koran Tempo*, Jakarta: 1 April 2002. (印尼文)
http://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ew.asp?op.id=108&id=47&tab=0

³¹ Bob Widyanarto, "Perkembangan Hubungan Ekonomi Antara China dan Indonesia," *KOMPAS*, Jakarta: 26 Maret 2007.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703/26/teropong/3410132.htm>

一、印尼國內經濟面臨困境爭取中共提供奧援

1998 年後印尼與中共關係開始大幅改善，印尼認為就人口而言（當時為 12 億人），中共是一個大國，並且擁有廣大的市場未來極具發展潛力；因此印尼對發展與中共關係極為重視，尤其在瓦希德擔任總統期間，取消了許多對華人民俗文化活動之禁令；以及之後的梅嘉娃蒂總統也在 2001 年 10 月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中，向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傳達希望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之期望。³²加上印尼自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經濟復甦的速度緩慢；³³故印尼在 1990 年後新外交時期的對中共關係發展策略上，應可視為印尼希望藉由中共的經濟快速發展與廣大市場潛力，作為印尼經濟復甦的奧援。

此外，印尼與中共於 1990 年 8 月正式恢復外交關係後，雙方領導人互訪日趨頻繁，主要的有 1990 年李鵬總理訪問印尼，以及同年印尼前總統蘇哈托訪問中共；1991 年楊尚昆主席訪問印尼；1993 年喬石訪問印尼等；目前兩國關係蓬勃發展。雙方政府領袖均可自然地出現在國際場合，此亦對兩國關係之增進具有正面意義；例如 1996 年在曼谷舉行的「亞歐高峰會」（Asia-Europe Meeting, ASEM），由於該會議除有歐盟 15 國以及包含印尼在內的東協 7 國參加外，中共與日本、南韓也參加；使得該會議被認為是推動世界經濟整合，並對美國未來世界霸權造成影響。³⁴此亦顯示中共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透過拉攏東協國家，壯大中共的國際發言權，以及對外的談判籌碼，甚至隱含中共即將發展成為區域的潛在領導者地位。

印尼與中共於 2005 年 4 月簽署戰略夥伴關係，則意謂著印尼與中共關係的重要轉捩點；加上中共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似可作為印尼向外發展的奧援。另一方面，印尼政府迄 2005 年，仍面臨諸多國內問題，除了包括峇里島爆炸案³⁵等一連串恐怖

³² Shafiah Fifi Muhibat, "Hubungan Indonesia-RRC," *Koran Tempo*, Jakarta: 1 April 2002. (印尼文)
http://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ew.asp?op.id=108&id=47&tab=0

³³ Hadi Soesastro, "Hubungan Indonesia-Cina Mana Dagingnya?" *KOMPAS*, Jakarta: 1 April 2002.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204/01/UTAMA/huba01.htm>

³⁴ 宋鎮照，〈從亞歐高峰會看東亞政經發展〉，《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8 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 85 年），頁 116。

³⁵ 2002 年 10 月 12 日在印尼峇里島觀光街俱樂部發生恐怖攻擊爆炸案，造成 202 人死亡，其中 88 人為澳洲籍。參閱 Irman G. Lanti, "Indonesia Accomplishment Amidst Challenges," *Southeast Asia Affairs* 2006, Singapore: ISEAS 2006, p. 101.

主義活動外，例如國內油價補貼、南亞海嘯後的復建等，仍使印尼疲於應付，更遑論集中精神專注對外政策。但美國在 2005 年底解除凍結對印尼的軍事援助，開始加強與印尼的合作關係，讓中共與日本、南韓共同進行的東協加三計畫，更顯得具有區域戰略之意義。³⁶尤其中共將與東協國家於 2020 年正式成立「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屆時更有利於印尼邁向拓展大陸廣大市場。

二、印尼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凸顯獨立自主外交立場

印尼與中共在 1990 年復交之後，兩國關係的快速發展可由雙方間的貿易量成長趨勢看出，例如 1980 年雙邊貿易量僅 5 億美元，但到了 2000 年則已增長到 75 億美元，2002 年更達到 100 億美元；以上充分顯示印尼在政治上改善與中共關係，但卻能為雙方的經濟帶來長足的發展。惟印尼國內亦有學者認為，印尼與中共的貿易量持續增加，但印尼出口前 20 名產品多為木材、天然氣等自然資源；而向中共進口者多為加工成品或半成品，恐將會打擊印尼的工業生產能力。³⁷儘管如此，印尼基於國家總體政治與經濟利益，仍然選擇與中共發展更密切之關係。

2005 年 4 月 25 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印尼參加「亞非會議五十週年」慶典後，與印尼總統蘇希洛簽署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印尼基於國家利益考量，希望藉由大量外資進入印尼協助經濟發展，才會積極爭取中共的奧援之外。中共本身的外交思想轉變，也是催化的因素之一。根據中共學者的研究，過去中共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外交思想核心因素是所謂的新中國之軍事安全、民族獨立和自力更生；但到了鄧小平主政時代，其國際戰略思想中的重點觀念則是經濟建設、人民富強和開放參與。在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的政策指導下，中共的對外交往逐漸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³⁸因此，印尼能夠稍微降低對中共的疑懼態度，接受與中共發展更進一步的外交關係。

³⁶ Michael Vatikiotis, "Southeast Asia in 2005 Strength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Southeast Asia Affairs* 2006, Singapore: ISEAS 2006, pp. 6~13.

³⁷ Hadi Soesastro, "Hubngan Indonesia-Cina Mana Dagingnya?" *KOMPAS*, Jakarta: 1 April 2002.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kompas-cetak/0204/01/UTAMA/huba01.htm>

³⁸ 余正梁、陳玉剛合撰，〈中國國際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20 年〉，《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10。

就印尼立場而言，印尼和中共恢復外交關係之後，前後任的總統從蘇哈托、瓦希德、梅嘉娃蒂到現任的蘇希洛，均相繼訪問過中共，顯示印尼重視與中共的關係。尤其是蘇希洛總統與胡錦濤簽署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表明未來要發展包括軍事科技在內的全方位關係，並也減少了印尼對美國鼓吹「中國威脅論」之影響力。³⁹由於東協國家過去冷戰時代甚受美國之影響力，而印尼目前能與中共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且預期未來雙方關係將會更為密切，充分凸顯印尼向來即標榜的獨立自主之外交立場。

³⁹ 區鉅龍，〈印尼與中國建立「戰略關係」之分析〉，《印尼僑聲》101期（台北：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民國94年9月），頁14~15。